

历史

新中国初期北京市工人的 唯物史观教育述论^{*}

黄 东

【提 要】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着力对北京城市工人进行政治教育,其重点是唯物史观教育,教学内容强调“劳动创造人”、“人类社会五个阶段”、“工人当家做主”等观念,教学方式以大量使用诉苦会为突出表现。唯物史观教育与新政权的执政合法性密切相关,这一教育措施为工人对党和国家的政治认同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关键词】工人教育 唯物史观 政治认同

〔中图分类号〕 K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952 (2015) 03-0102-07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首要任务之一,是在全国民众中,尤其是在工人中,确立其对党和国家的政治认同。基于此,全国各地的工人学习中增加了唯物史观教育的内容。北京作为首都,更是相应工作的开展重点区域。观察此时期的北京工人的唯物史观教育,可以从一个侧面透视新生政权对工人心理与思想重新塑造的机制及其成效。

新中国成立前,相比于上海、天津,北京大企业很少,小工厂及手工业作坊居多,整体工业呈现分散化。就北京工人整体而言,其对于新国家以及执政党的认识仍然存在模糊、混乱的情形。

此种情形,大致有三种代表性表现。第一,一些工人对于政治变化冷漠。例如,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在北京隆重举行,但到了10月10日,有工人还特地去问询有关方面,为什

么国庆节不挂青天白日旗?^①第二,一些工人认为共产党是“穷人党”,期待依托共产党获得好处,若不能做到,则对党心生怨望。据宣传部门人员调查,当时的工人和小生产者,“大量抱着‘经济观点’的眼光来接近我,起初他们在获得救济或加入合作社及兑得金元券后,表现得极积极,在清污劳军等运动中也卖力,但很快的就暴露了他们的尾巴”。一些特殊行业的工人,比如三轮车夫,其中不少反而恐惧经济发展,因为电车及公共汽车的广泛投入运营,会使他们失去生意,所以他们并不信任政

^{*} 基金项目:1.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大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研究(1949—1966)”(14BDJ014); 2. 中国政法大学校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资助; 3. 中国政法大学青年教师学术创新团队资助项目成果(CXTD 201108)。

^① 北京市委宣传部:“人城后对工人教育工作总结报告”,北京市档案馆馆藏,1/12/53。

府。^① 第三，受传统政治观念的影响，工人将新中国取代国民政府看做是传统的改朝换代，或者认为只是民国内部执政者的更迭；另外，在国民党大力宣传下，工人们对抗战胜利后苏联在东北的一些做法表示不理解。比如在长辛店这个北方工运的重要基地，新中国成立之后，党的政工人员发现“工人的觉悟一般的不高，受国民党的影响欺骗宣传影响很大，工人在训练班中提出了很多奇奇怪怪的问题，如‘苏联为什么搬走东北的机器？’‘苏联为什么占住大连、旅顺？’……‘为什么不挂国旗？共产党为什么要挂红旗？’‘给日本做工给国民党做工给共产党做工有什么不同？’‘为什么那（哪）个党来了（我们）都很受训？’……等等”。^②

除此之外，最为关键的是，大量的工人对于自己被剥削这一实际情况非但认识不清，反而有着强烈的宿命论的观点，认为自己之所以受穷是命该如此。在北京市委入城之后举办的各类短期培训班中，组织者发现，工人“在思想上普遍地存在着轻视劳动的观念，阶级觉悟很低，认为人生不过是‘上工下工’‘养家混饭’而已，无主人翁的感觉，信鬼神，凭命运”。^③ 又如在第八区组织的工人培训中，来自印刷、铁厂两行业的工人很多没有阶级观点，因为自己不是被资本家剥削，而是被资本家养活，资本家不雇佣他，“我只好失业，只有饿死了”。值得一提的是，在宿命论之外，少数人认为资本家付出了金钱和人力，所以“劳资是互相合作，彼此养活”。^④ 这显然是阶级合作的口吻。另外，工人们对于上帝造人、女娲造人乃至阴阳二气生人等等旧观念都比较认同，对于劳动造人却很难理解。例如，华北联工干部学校曾组织大量工人受训，其中二部十一班有个名叫杨润生的受训工人，他八岁就受洗，后又加入一贯道，“当教员讲社会发展史，说到‘劳动创造人类’的时候，他十分反对。他暗想：如果人类是从类人猿变来的，那末‘上帝’到哪里去了？发生万物的‘理’（一贯道的教义），又算哪一套？在讨论会上，他和大家顽强争辩”。^⑤ 所有这些都与中共的阶级革命理念格格不入。在中共和新生政权看来，纠正工人

不良思想，提高其政治觉悟，势在必行。

二

如何提高工人阶级的阶级觉悟？中共很早便认识到对工人进行政治教育的必要性，并且认为其关键是要对工人进行唯物史观教育。^⑥ 1949年4月3日，刘少奇在北平市干部会议上明确指出：“我们要进行一个普遍的初步的马克思主义初步教育，至少要计划半年。……工人运动必须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采取一切可能方法和机会进行教育。”^⑦ 同年的4月13日，中共北平市委决定普遍开展学习运动，认为要恢复生产，必须提高劳动人民的政治觉悟，“特别是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与组织性，则是完成这一中心任务的政治上的关键”。^⑧

大致在北京和平解放不久，对工人的政治教育就已经开始了。这一政治教育采取脱产与非脱产的两种方式。脱产方式主要是参加市委组织的干部训练班和工人学校，前者主要是工

① 内七区区委宣传部：“进城以来各阶层的思想动态”，1949年6月11日，北京市档案馆藏，40/1/132。

② 长辛店工作组：“长辛店工作组关于长辛店铁路工厂党的工作调查”，1949年2月10日，北京市档案馆藏，1/12/26。

③ 《中共北京市委关于入城后所办各种类型短期训练班给中央的综合报告》，1949年10月，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档案馆编：《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一），中国档案出版社2001年版，第747页。

④ 八区委组织部：“第二届工人训练班总结”，1950年2月12日，北京市档案馆藏，38/1/26。

⑤ 齐武：《华北联工干部学校介绍（续昨）》，《工人日报》1949年7月18日。

⑥ 相关研究有宋仲婉：《建国初期北京市职工的政治启蒙教育》（《北京党史》1995年第3期）和李晨：《北平解放初期对工人的唯物史观教育》（《北京党史》2013年第1期）以及黄利新：“共和国初期北京市城区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9~1954）”（首都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宋文为概述文字，重在对该校政治教育进行回顾，全文无史料出处。李晨在建国初期历任北京市石景山区委书记、市总工会秘书长、副主席，该文为其口述回忆。黄文相关章节于本题有简单涉及，但侧重点与本文不同。

⑦ 刘少奇：《关于北平接管工作中一些问题的报告要点》，《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一），第337页。

⑧ 《中共北平市委关于普遍开展学习运动的决定》，《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一），第382页。

会干部和积极分子参加；后者面向一般工人。不脱产方式就是进行业余政治学习，包括成立职工业余学校、工人夜校，在工厂内部组织学习小组和学习班等。关于参加政治教育的工人人数，相关方面并无统一的数据。北京市委宣传部在1949年12月的“北京市工人教育工作报告”中有一大致的统计，详见表一：

表一 1949年北京市工人参加政治学习人数表

培训机构	机构数	培训人数
工人学校	730	8893
学习小组	1547	26363
学习班	131	8834

（按：此处的工人是专指产业、手工业、店员及搬运工人，并不包括文教工作者等。据统计，此类工人总数达到257863人，表中参加培训人数为44090人，大体占工人总数的17.1%。资料来源：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工人教育工作报告”，1949年12月，北京市档案馆馆藏，1/12/9）

1949年10月，北京市委曾就入城后所办短期训练班的情形，向中央提交了一份报告，其中涉及到对工人的政治培训情形，同时对参加工人的政治状况、学历、工龄等情况，也有所简介。脱产参加短期训练班（市委干训班、总工会职业学校、天津职工干部学校、中央团校及各厂自办之训练班）学习者，共有4378人，其中工人占54.2%，工厂相关职员占45.98%。党员占16.74%。不脱产就在各厂进行业余政治学习者，共有19721人，其中工人占83.19%，职员占16.81%，另外，参加各区组织的业余学校进行政治学习者，还有10285人。这三部分培训人数总体上达到34384人。北京市委还专门对参加市委干训班和总工会职业学校学习的工人学员（共2003人）进行了学历分析，详见表二：

表二 干训班与职业学校工人学员学历程度分布表

学历程度	占学员总人数之百分比
文盲	2.14
小学	62.5
中学	33.84
专科	0.54

续表

学历程度	占学员总人数之百分比
大学	0.94

按：本表是笔者依据当时报告制成，表格中各项百分比相加为99.96%，不足100%，此应为当时统计讹误，原始资料对此并无相应说明。资料来源：《中共北京市委关于入城后所办各种类型短期训练班给中央的综合报告》，1949年10月，《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一），第745~746页。

当然，在干训班里，学员的党员比例较高，达到41%；在总工会职业学校中，党员占9.2%，青年团员占39.6%。至于参加培训的学员的工龄，北京市委并没有全面的数据，在报告中只是列举市委干训班第三期和职工学校的第二期的统计数据，详见表三：

表三 干训班与职业学校工人学员工龄分布表

市委干训班	
工龄	有此工龄者占学员总数百分比
3年以下	6
3~10年	66
10~20年	20
20年以上	8
职工学校	
工龄	有此工龄者占学员总数百分比
1~5年	43.68
5年以上	56.32

资料来源：《中共北京市委关于入城后所办各种类型短期训练班给中央的综合报告》，1949年10月，《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一），第746页。

从学历程度看，因为干训班和职业学校前期培训主要针对工厂骨干和积极分子，所以学员的学历程度相对较高，一定程度也反映出，作为工业城市和文化中心的北京，工人的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从工龄来看，干训班和职业学校的学员的工龄3年至10年占很大比例，这符合工厂技术骨干的特征。

就教学内容而言，各个教学组织大致相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是重点内容。北京市对于各级教学组织的教学内容并没有整齐划一的规定，但大致都包括历史唯物主义、中国革命与中国

共产党的介绍。刘少奇在1949年4月3日北平干部会议上曾经提及对工人政治教育的课程，分为四种：1. 唯物史观；2. 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3. 当前的政策；4. 组织问题。^① 1949年9月北京市工会成立职工学校，对工人进行政治启蒙教育。当时主要的教学内容有：1. 历史唯物主义（劳动创造人类世界，五种生产方式，阶级和阶级斗争，国家与革命，思想意识与革命人生观）；2. 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知识（工人阶级领导，三友四敌，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3. 党的基本知识（党的性质，党的指导思想，群众路线）等。^② 北京市各区同时期组织的工人学习在内容上大同小异。例如，第八区在1949年11月组织工人学习班，教学内容主要是：1. 阶级斗争。以艾思奇《社会发展史提纲》（初稿）为蓝本。该部分主要讲述：①劳动创造世界；②原始共产主义社会；③奴隶社会、封建社会；④资本主义社会；⑤共产主义社会。其中明确指出，讲述“劳动创造世界”就是要使得工人“确定人生观”。2. 中国革命问题。以党章教材为蓝本。该部分主要讲述：①中国社会的本质；②中国革命的任务；③中国革命的动力；④中国革命的特点。3. 中国共产党。以党章报告与党章教材为蓝本。4. 共同纲领。以政协文件为蓝本。^③ 同时期，北平市委举办了暑期学校，对市属学校的党员进行培训，培训内容也大同小异。包括三部分：1. 唯物史观（以艾思奇的提纲为主要材料）；2. 党纲党章（以刘少奇的修改党章报告和论党员修养为精读文件）；3. 部分党的当前政策。^④

为了达成政治教育的最佳效果，组织者主要从三个方面入手：

第一，突出教学重点。“各个训练班，针对着入学工人的思想特点，进行教育，教育内容以‘历史唯物主义’为中心”，“以劳动创造世界这一最基本的理论与思想教育作为改造思想，确立革命的人生观的武器，启发工人内在的思想斗争，认识到劳动神圣，劳动创造世界这一科学真理，分清敌我，分清是非，明确阶级立场，肃清盲目的‘国家观念’‘反苏’的思想，为主要教育方针与目的”。在此外，“又

以‘劳动创造世界’‘阶级斗争和国家学说’配合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及政治形势”，以国际主义，党史、党纲、党章等为主题，紧紧结合思想实际进行讲述。“应以历史唯物主义为中心，作为进行系统的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的初步，这样把基本问题解决后，其他枝节问题自然迎刃而解”，尤其“要把劳动创造世界的基本理论作为提高工人阶级觉悟的武器”，“若妄想的内容上无所不包，面面俱到，会分散力量。先后倒置，失去中心，多走弯路，结果卖力大，收获少”。^⑤

第二，在讲授方法上力求通俗、简要，结合工人思想实际。要想做好政治教育，“就必须事先对工人的思想情绪，进行精细的调查研究，方能针对工人的思想情况，尖锐地提出问题，抓住要害，以工人切身生活斗争事实来教育和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而不致无的放矢”。^⑥ 当时的教学在讲到“劳动创造世界”时，往往集中探讨“谁在干活”、“谁养活谁”的问题，于是工人上课的兴趣非常浓厚，讨论也十分积极，很好地达成了教学目标。

第三，采取广泛运用诉苦会的教学方式。早在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诉苦会就被大量运用在减租减息和土改运动中，对唤醒民众、培育民众对中共的政治认同，起到了非常显著的作用。不过，目前并没有史料表明，北京市委和工会从一开始便打算借用这一革命时期的工作经验。实际情形是，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学员要对学习内容进行小组讨论，结果讨论往往变成了诉苦。以第三期中共北平市委干训班

① 刘少奇：《关于北平接管工作中一些问题的报告要点》，《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一），第338页。

② 转引自宋仲婉：《建国初期北京市职工的政治启蒙教育》，《北京党史》1995年第3期。

③ “第八区十一月份工作总结汇报”，北京市档案馆馆藏，38/1/4。

④ 《中共北平市委关于暑期学校党员训练班工作总结》，1949年9月，《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一），第716页。

⑤ 北京市委宣传部：“入城后对工人教育工作总结报告”，北京市档案馆馆藏，1/12/53。

⑥ 北京市委宣传部：“入城后对工人教育工作总结报告”，北京市档案馆馆藏，1/12/53。

为例,这个培训班由铁道部等十七个单位的七百多个职工和干部组成,在唯物史观的讲座结束之后,各支部都展开了小组漫谈和讨论。“有些小组的学员在叙说自己的痛苦的身世时,引起了全组同学的痛苦和愤恨,学员们都这样想:‘我们工人阶级为什么以往受苦受得最重呢?这苦是从那里来的?谁又给咱们挖掉了这个苦根呢?’因此,十六支部便提议:让小组成员里典型的受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压迫剥削的学员,到支部会上把亲身经历的苦水吐出来,使大家明白学习中所说的三个敌人(笔者注:指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是如何地在使劳动人民受压迫的剥削,这苦是多么的重”。结果实行之后效果很好。于是,培训部门便酝酿召开支部的诉苦会和全班诉苦大会,以使学员从具体的苦难倾诉中,提高阶级觉悟。1949年8月3日,全班诉苦大会举行,除了该班全体学员参加外,还有市委党训班的几百个学生党员到场旁听。大会连续开了两天,一共11位学员,纷纷诉说他们如何遭受三座大山的压迫剥削和如何得了解放的事实。听众们常被他们的苦情激动得流泪,然后又从悲愤中重新兴奋起来,表示回厂以后要加紧生产,支援前线,解放各地还在苦难中的同胞。诉苦运动之后,大部分学员表示:“在课堂上听到三个敌人时,还不十分冒火,等听了同学们的诉苦以后,我们真的气得起火了。”^①由此可知,诉苦活动起初并不是唯物史观教育的规定项目,而是在教学过程中的学员自发产生的行为,因其良好的效果从而得到重视并加以推广。当然,在对工人进行政治启蒙教育的过程中,工人学员在讨论中自发倾诉苦难,恰可证明在资本家的压迫剥削之下,朴素的苦难感是客观存在的,教育主导者所要做的,是如何通过组织有针对性的苦难倾诉活动,来更好地达到教学目标。

教学内容明确、教学语言通俗、教学手段革新,诉苦更是触及人心。这些做法使得工人政治启蒙教育取得良好效果。上文提及的杨润生,尽管与人激烈辩论,但“时间并不太久,他听懂了剩余价值学说……他知道了社会发展

史比‘上帝’‘天理’更有道理”。^②那些认为自己穷源于命运不济的工人听了劳动创造了世界以后,明白了谁养活谁,例如参加培训的同义印刷工厂的王建说:“即使资本家挣了一万元,给我们九千元,他自己只留下一千元,他还是剥削我们,因为他不劳动,还是我们养活他。”“工人也明白了自己是历史的主人,懂得阶级斗争是工人阶级的武器,今天对资方必须团结又斗争。玉兴铁工厂的资本家预备解雇工人,备了酒菜请工人井方芳去吃饭,想征求他的同意,井方芳严词拒绝,饭也不吃就走了。”^③又例如,石景山发电厂的工人存在严重“宿命论”的迷信思想,该厂一贯道徒占到工人总数的30%,但经过政治教育之后,工人们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中白日班的工人张丈起说:“我进了一贯道后他们都说有鬼啦、有神啦,闹得我深夜不敢出门,还说什么享福受罪不由自己,那是命中注定,所以我净觉得活着没有劲,无非是受苦受罪,今天才知道世界都是穷人造成的,活着吧!有熬头还去叫人看不起,今天成了主人了。”另一个学员丁志光说:“过去愿(意)穿点好的,怕别人看出自己是臭工人,闹了半天,只有工人伟大光荣。”学员高文卿说:“我五十七岁了,平常净说,命穷没法,只有受罪,落了个外号叫‘大好人’,现在算知道,不受罪只有斗争,不能落一辈子‘大好人’。”^④

经过初期的政治教育,工人对党、新中国以及苏联都有了全新认识,“解放以来,工人在思想上起了很大的转变。从解放前后的对比中,工人增强了对国民党的仇恨,加深了对共产党的信任与拥护,从学习中知道了劳动创造世界,破除了迷信宿命思想,启发了阶级自觉,明确认识工人阶级是新中国的领导阶级,树立了当

① 《市委干训班开诉苦大会》,《工人日报》1949年8月7日。

② 齐武:《华北联工半部学校介绍(续昨)》,《工人日报》1949年7月18日。

③ 八区委组织部:“第二届工人训练班总结”,1950年2月12日,北京市档案馆馆藏,38/1/26。

④ “石景山发电厂工人教育情况简报(教字第一号)”,北京市档案馆馆藏,1/12/38。

家作主的观念，转变了劳动态度，提高了生产的积极性。此外，工人对苏联的认识也有了基本的转变：了解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羡慕苏联工人生活，要求向苏联学习技术”。^①

三

在对工人的政治启蒙教育中，坚持以唯物史观教育为中心的做法，可谓纲举目张。“劳动创造人”、“劳动创造世界”等观点不仅是教学中的重要概念，更是确立起工人自豪感建构的逻辑支点。既然劳动能够创造世界，那么，谁在劳动？当然是工人、农民等劳动人民，由此得出工人创造世界的结论。这种简单直接的逻辑成为打破工人思想中的宿命论以及确立工人自豪感的利器。当讲到“劳动创造世界”时，往往教员的一句“没有大家做活，谁不饿扁？谁不冻成冰棍”，就会引起工人们赞同的笑声。^②

彼时唯物史观教育的核心，是要在工人心中确立起人类社会以阶级斗争为动力的线性进化的历史观，人类社会在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之后，未来的发展方向必然是共产主义社会。要让工人认识到工人阶级是资本主义社会最为革命的阶级，作为其代表，中国共产党是推动中国历史发展的核心力量，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其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是无可争议的具有先进性的领导者。在推动社会进步的过程中，共产党领导革命及作为新中国的政治核心的合法性就来自其对工人阶级的代表性。所以说，建国初中共在城市工人中进行唯物史观教育，与中共构建新政权的政治合法性有关，是确立全新的革命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环节。

在教学中，诉苦会的引入可算是唯物史观教育取得良好效果的关键性抓手。在社会动员中，诉苦对于参与政治运动的主体有着特殊的意义。通过诉苦会或控诉大会，工人的苦难得以宣泄，并寻找到了所受的痛苦的根源——剥削，进而对于“三座大山”的压迫感受更加强烈。诉苦对参与者的情感唤醒和斗争情绪的培育都有着极强的作用。正如裴宜理所言，通过

“提高情绪”以产生奉献精神是中共实现革命目标的重要特点。与国民党不同，在实现革命目标的过程中，中共对“情感工作”的依赖程度更高。“通过运用‘诉苦’、‘控诉’、‘批评与自我批评’、‘整风’和‘思想改造’等一系列手段，中国共产党无论在其新成员还是在其骨干中，都强调每个党员对情感工作所负的责任”。^③这是中共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原因。毫无疑问，诉苦无疑是动员参与者的情感力量以实现革命目标的重要手段。当然，这只是从政治发动和社会动员的技巧进行分析，并不能也不应该否认工人受到资本家剥削的事实，在剥削中工人存在着朴素的压迫感也是事实，差别只是在对这种事实和感觉的合理性解释上。诉苦会的重点不在于让工人去发现压迫，而在于要将压迫归因为阶级斗争，进而促使工人认可社会革命和人类解放的规律。

通过唯物史观教育，工人不仅获得了政治自信，建立起劳动光荣的荣誉感，对资本家产生出阶级对立感；而且在建立起对未来新世界向往的同时，初步奠定了对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政治认同。对工人进行政治教育，是新中国对城市群体进行社会动员的前奏，是动员型国家治理的重要环节。从史实看，在教学中，“劳动创造世界”的论证逻辑之简单直接，诉苦讨论会的大量使用，无疑对于工人政治观和政治认同确立都起到了极大作用。

在对工人的唯物史观教育中，常常使用“谁养活谁？”“谁在干活？”这样的设问，毫无疑问，是很有力量的，也容易激发工人的思考和情绪，产生的教学效果也很显著。但将“谁剥削谁”与“谁养活谁”对等，是将“养活”简单化了；将“劳动”等同于“体力劳动”，是将“劳动”简单化了。尽管工人的自豪感迅速建立，但此种简单化的操作未必完全正确。在

① 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工人教育工作报告”，1949年12月，北京市档案馆藏，1/12/9。

② 第八区区委：“七月份工作汇报”，北京市档案馆藏，38/1/4。

③ 裴宜理：《重访中国革命：以情感的模式》，刘东主编：《中国学术》第8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99页。

本文的第一部分,当一些工人基于生活经验提出“劳资是互相合作,彼此养活”的认识后,没有资料证明,教育者是如何通过严密的逻辑论证去说服工人,更多的情况可能是,在“劳动创造世界”的简单逻辑图示下,在诉苦会的激烈氛围中,这些工人都放弃了原有的模糊认识。但恩格斯分明说,“马克思了解古代奴隶主,中世纪封建主等等的历史必然性,因而了解他们的历史正当性,承认他们在一定限度的历史时期内是人类发展的杠杆;因而马克思也承认剥削,即占有他人劳动产品的暂时的历史正当性”。^①那么,在新中国建立之前,这种暂时的历史正当性消失了没有?在漫长的阶级社会中,对立性阶级之间的某种阶段性合作本就是生产力发展的需求。何况按照中国革命的话语体系,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跟中国的无产阶级一样,共同面临着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威胁,“劳资是互相合作,彼此养活”本就是当时中国生产力未发达时应有的面相。在对工人的唯物史观教育中,确立起工人对于资本家的鄙夷与否定。日后,从社会心理而言,

当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改造时,大部分民众便认为此措施乃是顺理成章的。另外,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思想教育中的诉苦会往往与其后对反动分子的控诉大会前后相承,是党对工人进行教育与社会动员的系统体现,由此,工人视党和国家为救星,产生出一种感恩型的政治认同。这种情感对于当时的动员型国家治理发挥了极大的历史作用。当社会重新走向市场经济,工人、国家、执政党和资本都将在社会转型中去寻找合适的位置,毫无疑问,此种政治认同也需要新内容,以适应时代要求,这无疑是在充满挑战性的历史任务。

本文作者:历史学博士、法学博士后、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赵俊

① 恩格斯:《法学家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57~558页。

A Review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Education for Workers in Beijing in the Early New China

Huang Dong

Abstract: During the early period of P. R. C,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mainly focused on the educa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for workers in Beijing, which was related to the legitimacy of the new regime. The goal of the education was helping most workers to understand and accept the main idea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for instance, labor creating human, the five stages of human society and the masterhood of the worker, etc. To achieve the goal, meetings for pouring out grievances were held frequently as an effective way to educate workers. As a result, this special educational measure made a success in laying a foundation of the workers' political identity with the Party and P. R. C.

Keywords: education for worker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political identity